

目 录

青少年时代的知识积累·····	(2)
渡过长江去·····	(9)
藏书和查书的故事·····	(17)
大学里的读书生活·····	(25)
未有收成的唐诗研究·····	(33)
在“反右派”运动的风浪中·····	(41)
在河北省偏僻的山村里·····	(49)
狂热和颠疯的岁月·····	(57)
编辑生涯的片断回忆·····	(65)
浏览二十四史·····	(73)
齐步奔向“文革”的灾难·····	(81)
“文革”读书记(上)(下)·····	(89)
研究鲁迅的历程·····	(104)
与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·····	(113)
读新潮书·····	(122)
关于杂文的思考·····	(131)
关于游记的思考·····	(139)
关于散文的思考·····	(147)
对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思索·····	(155)
登埃菲尔铁塔记·····	(164)
夕阳下的沉思·····	(172)

青少年时代的知识积累

我读了一辈子的书，至今依旧读得津津有味，还想不断地扩展自己知识的领域。清代初年的大学者阎若璩，曾集古人陶弘景和皇甫谧的话语自诫，“一物不知，深以为耻；遭人而问，少有暇日”，我十分佩服他这种严肃认真的读书态度。不过生活在今天的人们，早已无法达到这样博识的境界了，因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，各种知识领域已经变得异常丰富和广阔，日新月异，大量增加，不像古人那样按照经史子集的程序，苦苦地读上几十年，大致说来总还有读完的希望。二十世纪的科学分工实在太细密了，不管是知识多么渊博的学问家，肯定都不会有本领读懂所有的书，更不会有时间读完所有的书了。

虽说是无法读完整个世界的书，不过只要多读上一本，多获得一点儿新的思想和知识，对于我这个知识面很窄的人来说，就会高兴好几天。不少喜爱读书的年轻朋友，问我怎样养成了这种很愿意博览群书的浓厚兴趣？说来也奇怪，我的这种兴趣绝不是来自儿时私塾里的背诵《四书》和《五经》，而是来自听乡野之人的讲《三国演义》。

记得在上小学六年级之前，正悠哉游哉地度过暑假，白天去田垄里捉鹌鹑，去瓦砾场里抓蟋蟀，夜晚就搬一张竹榻，放在大门外高高的槐树底下，斜躺在上面，一边仰望天空里的星斗，一边还听着喜欢讲古的老汉，给团团围坐着的少年们开讲《三国演义》。这老汉识字不多，大概未看过原著，肚子里存着的全是些耳食之言，讲得零零碎碎，无法连贯起来，刚说完了刘、关、张桃园三结义，就跳到诸葛亮的借东风了，还说不清曹操是怎么死的？孩子们讥笑他，跟他争论起来，他心里很

不服气，脸却胀得通红，看我并不跟小伙伴们随声附和，就夸我聪明厚道，悄悄问我这中间遗漏了哪些情节？还有哪些话儿说得不对？我也从未看过此书，一句话都答不上来，脸上也像他似地堆起了红红的云霞。

有个调皮的小伙子争强好胜，说是谁讲得好，就天天摆擂台，连续往下讲，讲不好的就下台，看来他发表讲演的欲望还相当强烈，大家就推他开讲了。其实他尽是胡扯，说什么赵子龙会吹出一股“探囊气”来，顷刻间就可以割下敌将的头颅，还说《三国演义》里有这种本领的将帅，不会超过十来个人，讲得唾沫横飞，洋洋得意。好几个少年伙伴都跟他抬杠，说是哪儿会吹出这样的气息来，大家争得面红耳赤，却也是谁都驳不倒对方。我对这些争论依旧无法插上一句话，虽然小伙伴们都用求援的眼光瞧着我。

于是我下了决心要通读一遍《三国演义》，好不容易从家里的阁楼中间，找出了这部厚厚的线装书来，竟读得茶不思饭不想，愈是往下读，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，就愈是显得豁然开朗了。至于那个小伙子说的什么“探囊气”，原来是书里形容那些英雄们本领高强，在马上杀敌，犹似“探囊取物”。为什么会以讹传讹，将“探囊取物”说成是一种奇妙的“探囊气”，造成这么大的歪曲和错误呢？当时觉得实在可笑，不过今天想起来，却又觉得这还不仅是一件可笑的小事，却含着很深的含意呢，因为如果不从科学出发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，而是一味地夸大和引伸，从“探囊取物”附会成“探囊气”，这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。今天像这样的以讹传讹的治学风气，不还是很常见到的吗？

小伙伴们知道我通读了一遍《三国演义》，纷纷怂恿我在夜晚的星空下开讲，我鼓着勇气说了有半个月，直到暑假结束为止。因为刚看完原著，少年时代的记性又好，当然不会有

什么差错的，大家都听得纷纷拍手，这使我进一步树立了读书的信心，我原来已经在母亲的督促与鼓励下，养成了喜爱读书的兴趣，这一回无疑又是极大的促进，竟养成了自己一生读书的习惯。

如果从认真治学的角度来说，要想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话，就得充分地了解和掌握第一手的原始材料，如果没有很好地阅读过《三国演义》，就不能够将它准确地复述出来。正是少年时代留下的深刻印象，使我几十年来始终都强调这个重要的问题。我在治学中一贯注意第一手材料，十余年前为青年朋友们写的小册子《文学研究入门》中，还专辟一节讲述此事，这其实也是来自《三国演义》的启迪。

在初中毕业之前，我的家乡始终被日本侵略军所占领，过了好多年亡国奴的生活。同学们所崇敬的国文老师瞿抱一先生，常常和大家讲述社稷兴亡与忠臣义士的故事。文天祥在大都死牢中写《正气歌》的崇高节操，史可法于扬州城内殉难的壮烈情怀，使我们都听得肃然起敬。大家发誓要保持民族气节，用对于侵略军的消极抵制，迎接光复的到来。我至今还怀念着这穷乡僻壤的淳厚民风，几乎还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有谁向日本侵略军和寥寥几名汉奸告密的事情发生。

瞿老师史学的底子相当深厚，关于南明抗清的许多掌故，几乎是他跟我们闲谈的最为重要的内容，从弘光小朝廷的腐败，说到张煌言和朱舜水的义军，郑成功的收复台湾，瞿式耜的以身许国，以及永历帝被吴三桂俘获和杀害的惨剧。他大骂吴三桂卑鄙和残忍的奴才心理，说是大凡甘心做奴才的人，往往比主子更为凶恶和暴虐，因为他害怕主子会怀疑自己不忠，所以要干出许多极端的行为去献媚。他对于奴才心理的剖析和谴责，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。

我在后来读鲁迅的杂文时，才进一步领略了他对于奴才主义深入骨髓的鞭挞，然而如果没有瞿老师那段话语的影响，我也许就无法懂得鲁迅笔下的那些深意。从此以后，我懂得了只要世界上还有专制主义的统治，还有主子和奴才，还存在着人身的依附状态，就必然会出现许多残酷和无耻的暴行，从而使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下降，因此在长期以来，追求整个社会平等的原则，成了我学术研究的重要主旨，这真得感谢瞿老师的启迪。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，想到了伏尔泰和贝多芬那些伟大的人物，也想到了少年时代这位崇敬的老师。我深感在认识同样的一个问题时，杰出的人物和并未成名的普通人之间，往往会存在着相同的情形，往往会得出相似的结论。

瞿老师所讲述的这些南明掌故，早已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。1947年初秋，我从家乡转学到上海去念中学时，碰到过一个正在读文科的大学生，当我在与他随便的闲谈中间，得知他压根儿就不知道瞿式耜与朱舜水这些人的名字，惊讶他竟会如此的缺乏知识，十里洋场中的一个文科大学生，在这方面竟还不如穷乡僻壤的中学生来得明白，因而对瞿老师的一种感激之情也就油然而生了。

是否知道瞿式耜或朱舜水这样的人物，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，也许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，然而从总的发展方向看来，应该让青年一代获得广博的知识，这样可以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素养，陶冶他们的情操，使他们在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上去进行思索，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。须知一个知识很狭隘和浅陋的人，是不可能担负起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责任的。

记得我后来上大学时，读遍了《明季南略》《小腆纪传》这一类叙述南明历史的书籍，觉得十分的熟悉，像是又复习了

一遍昨天的功课，这是因为它的基本线索和思想含义，我早已听瞿老师说过了。我一生对史学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，从明史扩大到全部中国的往昔，再扩大到整个世界的进程，对人类的昨日和明日，都能有一种概括的了解和清醒的预测，这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瞿老师的赐予。

培根说，“读史使人明智”，这真是一点儿也不错的。懂得了历史，就可以对人间所有复杂变故的趋向，都能了如指掌，如果从这方面对人们加以引导，肯定会使他们大大地开阔自己的眼界，善于站在宏观的境界去俯视历史和时代，这样就更有可能对推动社会的前进作出更大贡献。

我在上海的吴淞中学读书时，那位忠于职守的老校长，曾给自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，据说他曾当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督学，一个胖墩墩的高个子，常常像威严的军人那样，挺立在学生的面前，可是他既不崇拜拿破仑，也不敬仰纳尔逊，滋润着他心灵的，是中国历代相传下来的儒家思想。在这个十里洋场的上海，我们听到的是爵士音乐，见到的是好莱坞电影，多少人向往着美国的生活方式。然而我们的老校长偏要发思古之幽情，也许是想用儒家学说来拯救文化的沉沦和道德风气的堕落罢，竟下令用《孟子》作为公民课的教本。

负责“党化教育”的训导处副主任，那个西装笔挺的三青团小头目，肚子里装的知识实在很有限，自然教不了这个，听说他跟老校长争论过，不能用《孟子》来代替《三民主义》，却被老校长“吾党所宗，在于维系中国固有文明”的几句话，痛快地质驳了回去，一声也吭不出来。国民党的“党化教育”，根子确实在于依赖维护尊卑观念与专制主义的儒家学说，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思想基础，来反对主张社会主义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，因此讲授“四书五经”自然是不会错的。

三青团的小头目既然教不了，就换了个历来讲授古文的老先生来教我们。他教得十分认真，先是从训诂入手，接着讲解段落大意，最后又阐述每章的要旨。他常常从春秋战国时代复杂的局势出发，论述孟子那些主张的重要意义，真是虚实结合，贯通经史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处处闪烁着精辟的见解。

我们这些活泼泼的小伙子，对于这本多少个世纪之前的著作，原来总觉得是十分枯燥乏味的，可是由这位老师讲授起来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，我当时甚至能将它背出大半本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曾朦胧地想到过，不管是什么枯燥乏味的知识，只要真正地懂得了它，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。许多大科学家终生都孜孜不倦，钻研他们这一专业的学问。这些知识在外行的人们看来，很可能是莫名其妙和毫无乐趣的，可是到了内行的面前，却会从中获得无穷的欢乐，而且这是一种纯粹和圣洁的欢乐，不像在追求金钱和权力的欢乐中，还包含着耍弄计谋和勾心斗角时的忐忑不安，那种内心的紧张与恐惧，有时简直像是慢性自杀。

再回过头来说《孟子》这本书，我早已在少年时代，就知道它算不得是一本“纯儒”的典籍。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为这里边有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话，竟怒气冲冲地下令，从孔庙里撤出孟子的牌位。不知道老校长为什么会如此厚爱《孟子》这部书呢？不过孟子无论如何是位“亚圣”，归根结底还是主张“无君子莫治野人，无野人莫养君子”的，这也许是他儒家中间还站得住脚的缘故，老校长也许正是想以此来教导莘莘学子的吧。

我对于《孟子》中的这个基调，在当时就是很反感的，也许是卢梭追求平等思想的启迪，对我产生了一丝朦胧的作用。然而孟子的有些命题，还是让我终生受用的，譬如他所说的“尽

信书则不如无书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矣”，就给了我极大的启迪。首先是从方法论的角度，对很多带有权威性的传统见解，产生了怀疑的勇气，我毕生治学都主张反对迷信，强调独创和开拓的精神，也许就是在这儿撒下的种子吧？至于像孟子所论述的那样，对《尚书》里的《武成》这一篇文献，也只相信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在后世那些对儒家经典顶礼膜拜的人们眼中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啊！那真是一种何等的气魄和见识！然而孟子又对此分析得合情合理，如果真的是“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”责问得真是太好了，简直是让人无法辩驳。

反对盲目服从，主张独立思考，这是多么可贵的思想。治学就是要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，然后去得出准确的答案来。如果我们在今天还赶不上《孟子》里的这种精神，那么不就是一种可怕的倒退状态吗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，确实有一种引导人们倒退的惯性力量在产生作用，否则就无法说明我们长期都不能够迅速前进的原因。对这种趋于倒退的惯性力量，应该怎样进行反思和澄清呢？这不能不成为知识分子必须担负起来的历史使命。

渡过长江去

1949年2月，我辗转去了江苏盐城解放区的华中大学。刚安顿下来听了几回报告，就被编进了南下的部队，经过匆匆的行军，集合在长江的北岸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的薄暮时分，一轮血红的夕阳早已沉入了江面，头顶上深蓝色的天空却依旧在闪闪发亮，朵朵的白云和多少道紫色的晚霞，总在偷偷地窥视着我们。我们这一群赤手空拳的伙伴，正混杂在许多荷枪实弹的战士们附近，悄悄地躲藏在长江北岸的芦苇丛中，焦急地等待着漆黑的夜晚赶快降临。正午时分就下达了命令，说是队伍埋伏好了之后，无论发生什么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，都不准许随便地动弹。我默默地扭动着颈脖，张望着背后田野里密密层层麦苗，然后又抬起头颅，注视着面前汨汨流淌的江水。

暮色终于渐渐地黯淡下来，苍茫的天际开始变得灰暗和黝黑了，艳丽的霞光和飘浮的白云也完全消失了，背后的田畴和面前的江水都笼罩着一片浓墨似的颜色。“现在可以渡江了罢！”我紧张地瞪住双眼，眺望着什么也瞧不见的黑夜，从心里升起了这个渴望已久的念头。

漆黑的半空中，突然闪烁和飞驰着几点暗红的星光，我正惊讶地想跟旁边的伙伴耳语时，这不祥的光亮迅速地逼近过来，随着一阵刺耳的声响，几架朝向江面上俯冲的飞机，凶猛地掠过我们头顶，还噼噼啪啪地扫射起枪弹来，不知道是否在迷茫的夜色中发现了我们？当吵闹的枪声消失过后，整片土地上又像是死寂一般的静谧起来，可是刚等我轻轻地嘘了口气，那几架远去的飞机又兜着圈子，歪斜地呼啸着冲刺了过来。我的心

儿剧烈地进跳着，扑通扑通地像是直往喉咙里蹿去，异常恐惧地等待着一阵阵密集的枪弹，从黑暗的半空里扫射下来，“会有哪一颗枪弹击中我的头颅吗？”我将胳膊支撑着潮湿的泥土，在吹拂着芦苇的微风中，寻觅着卧倒在附近的伙伴们，隐约地瞧见有人弯曲着身躯，紧紧地贴住地面，让低矮的芦苇遮掩住自己，似乎也在倾听和分辨那罪恶的枪声，正在哪儿毁灭着青春的生命？

敌人的飞机终于消失了，黑夜又陷入了令人颤栗的沉默之中，大家都焦灼和紧张地等待着那个鼓舞人心的命令。突然从远处传来哨子和叫喊的声音，只见多少人纷纷地站立起来，排成了长长的队伍，轻轻地跨越着茂密的芦苇，往前边的港汊走去，一阵风儿似地登上早已停泊在那儿的多少艘帆船，一齐静悄悄地启锚离岸了，在不住起伏的波浪中颠簸前进。浓厚和湿润的雾气笼罩着幽暗的江面，在那遥远和迷蒙的顶空，弥漫着浩瀚无际的黑暗里，几颗神秘的星辰不住地闪烁着眼睛，是在瞧着我们渡过长江去吗？我一直担心着的那几架飞机，再也没有在头顶出现过，迷茫和朦胧的对岸更是寂寥得悄无声息，从未传来过任何枪炮的声响。

汹涌的波涛冲撞和拍击着帆船的双舷，哗啦啦地震响着，却遮不住我背后几个伙伴悄悄的说话声，好像是在议论刚才向我们扫射的敌机，打死了一个很熟悉的战友。我的心微微地颤抖着，沉重地惋惜和悲悼他不能跟大家一起渡过长江，看到革命的火焰烧毁那专制和罪恶的政权，看到自己的同胞在解放了的土地上，开始迎接和创造公正与幸福的生活。

黝黑的顶空逐渐泛出灰褐的颜色，隐隐约约地看出了对岸零零落落的树木和房屋，我抬头仰望着迅速变成浅灰色的天空，发现了一抹鲜红的朝霞，似乎在祝愿和鼓励我们平安地抵达江

南。多少艘帆船终于陆续地靠岸了，浩浩荡荡的队伍又从江阴的岸旁，急匆匆地往南边行军。热辣辣的太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射着大家，我们只管噤噤地往前赶路，走过了村庄的小桥，穿过了集镇的街道。我的额头上淌满了汗水，浑身都湿透了，还感到饥肠辘辘的，似乎全身都没有气力了，再也无法跨出整齐的步伐了。幸亏传来了命令，让大家在路旁的一片树林底下休息，我赶紧丢下背包坐在上面，从挂在肩头的行囊里掏出雪白的馒头，急促地塞进自己嘴里。

记得是次日的午后，我们才到达无锡城里热闹的火车站旁边，排成一字儿的长队，半声都不吭地坐在人行道前面。一群往返的路人围堵着观看我们，有几个年轻的男女推着一辆板车，抓起了堆放在车上的烧饼，想分发给我们这些沉默和腼腆的士兵，却被大家摇晃着手臂，笑咪咪地拒绝了。于是许多路人更好奇地打量着我们，还纷纷凑上来说话，咒骂着国民党部队撤退前疯狂抢掠的暴行。

有一队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女兵，踏着飒爽的步伐走了过来，英武地站在围观我们的路人面前，昂扬和欢快地唱起了《解放区的天》这首歌曲。我听着她们嘹亮的歌声，想象着贪污和腐败的国民党专制政权正在土崩瓦解，受尽压榨和蹂躏的老百姓，应该过上自由、平等和富足的幸福生活了，那么自己应该怎样努力地去工作呢？

就在当天夜晚，我们乘上一列敞篷的火车，直向苏州驶去。因为上海还被国民党的军队占领着，得防备他们出动飞机来扫射，火车上不许有半丝的亮光。我张望着前面黑漆漆的一长串影子，在幽暗的星光底下飞快地颠簸着。虽然担心会有敌人的飞机袭击，却挡不住整天跋涉之后浓重的睡意，在凉爽的夜风里昏沉地入睡了，突然又被伙伴们此起彼伏的一阵阵鼾声惊醒，

立即把军帽压住眉梢，头颅微微地摇晃起来，听着嘎嘎的车轮声，又朦胧地入睡了。在江北徒步行军的时候，一个晚上我都能够睡上十来个回合，何况这时候坐在平坦的地板上，是一种多么奢侈和巨大的享受啊！

一位总是关心着大家的老战士，轻轻地吆喝着，“千万别睡着了，会感冒生病的！”可是那打雷一般呼啸的鼾声，压倒了这柔和得像催眠曲似的呼喊。

坐在敞篷的车厢里往前方冲去，真是太惬意了。我回忆着去年秋天在上海读书时，飞涨的物价让自己囊中空空的，曾有多少回忍饥挨饿的经历，忍不住在心里诅咒起来，“谁让你国民党的官僚们贪污腐化，这会儿叫你慌慌张张地逃跑了吧！”

在满天都涂抹着红霞的黎明时分，我们抵达了号称是人间天堂的苏州，我记住了那一天是1949年的4月27日。队伍排得更整齐了，跟随着前来接应的同志，挺起胸膛大踏步地走过几条宽阔的街道，突然在幽深的小巷跟前，自己所属的这个中队被招呼着停下了脚步，目送着长长的队伍继续往前走去，然后就悄悄地穿进了巷子，瞧见在几棵婆娑的梧桐树底下，一垛高耸和厚实的围墙中间，两扇闪亮的铁门正敞开着。我刚走进大门，就看见一大片碧绿的草坪背后，飘荡着浮萍的池塘旁边，矗立着一座翘起飞檐的凉亭，好像在招手欢迎我们。一排鲜红的月季花簇拥着缀满玻璃窗门的楼房，多么漂亮的宿营地啊！大家沿着低矮的石阶，纷纷跨进了厅堂的门槛。我张望着四周雪白的墙壁面前，竟空荡荡的没有留下任何贵重的家具，有些疑惑地把肩头的背包，放在光亮的红漆地板上，正想跟随好奇的伙伴们咚咚地攀上楼梯，站在阳台上俯瞰这蒋介石前妻姚怡琴公馆的全貌时，忽然听到轰隆一声的巨响，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匆忙地奔向花园里去。

“乱弹琴，哪里还像个遵守革命纪律的战士？简直就是国民党的土匪作风！”中队长高亢和严厉训斥声，在花园里震响着。

我赶到屋檐底下张望，瞧见中队长的警卫员正站在池塘旁边，低垂着头聆听训斥。好几个伙伴围在中队长身旁，听他怒气冲冲地说话。原来这警卫员往池塘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，炸死了好多浮游的鱼儿，正想捞出来送往厨房里给大家加餐，是怀着一片好心做出的蠢事啊！

在那天午后，铁门外边挂出了青年工作队的招牌之后，就有许多年轻的学生、工人和店员们，成群结队地找来，簇拥着跟我们说话。这些狂热地向往着革命的青年男女，大声喊叫着多么憎恨那可恶的旧世界，希望建立一种光明和理想的新秩序，有的愤懑地控诉着资本家的欺凌，还有的要求立刻就报名参加革命的队伍。像火一样滚烫的热情，也在我的心里不住地燃烧，从早到晚都滔滔不绝地跟这些来访者交谈，每天都把自己的嗓子喊得发哑了还不肯罢休。

正在兴奋地款待着跟自己同样年轻的来访者时，我被调往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巡逻队，既然是革命的需要，当然就毫不犹豫地前去报到。因为国民党军队刚从这儿溃逃而去，少数失散的残兵败卒竟落草为寇，再加上附近的地痞流氓，混杂在一起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，扰乱和威胁着多少居民的安全。革命不正是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吗？于是我每天都在迷茫的暗夜里紧握住手枪，很快乐地跟随着伙伴们巡游于苏州的大街小巷中间。

有一回我们这七八个人的队伍，正冒着半夜里滂沱的大雨不住地转悠，紧密和沉重的雨珠从我头顶直往脖颈里灌，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冰凉的潮气一阵阵地扑进了心窝。我颤抖着

贴紧泥泞的墙壁，悄悄地挪动歪斜的脚步，张望和倾听着房屋背后的动静。站在我身旁的战友小周，对着我耳朵轻轻地朗诵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“悠长又寂寥的雨巷，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。”

雨水更凶猛地倾泻下来，沿着我耳朵两旁哗哗地滴落，从湿透的衣衫直往脚底奔腾，贴住我两腿的裤管竟变成了流淌瀑布的峭壁。在潮湿和寒冷中间我禁不住打了个喷嚏，响亮地应和着他的腔调说道，“我希望逢着一个暴风雨一样地残忍的强盗！”

想不到这个苦中作乐的小小插曲，竟引起了未曾预料过的麻烦。原来在前边带路的老姜，竟把我们即兴朗诵的事儿，添油加醋地向局长汇报了，还批评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，如果不加制止的话，会在今后的巡夜中造成很大的危害。小周在那天午后跟我一起喝茶聊天时，诉说了这个刚听到的消息，提醒我不能总是大大咧咧的，对谁都不加防备。他还说起自己在渡江之前入团转正时，支部会上所有发言的团员都同意他的报告，正要举手表决了，老姜却瞪着眼睛叫喊起来，说是很多同志入团都并无预备期，至多也只是三个月，为什么对小周会有这半年的规定，是不是有过参加三青团这一类的政治问题？得老实地在会上交待一下。小周说当时真把自己气坏了，又蹦跳又叫嚷的，说是当时的团支书不懂得章程，还狠狠地咒骂他诬陷好人，会不得善终的，结果是因为态度欠佳，至今还未曾通过转正。老姜曾上过两年大学，很会讲一套革命的理论，我刚来这儿报到之后，他就找我谈心，鼓励我好好地进步，我还真的从心里钦佩和感谢他，哪儿知道他竟会这样的口蜜腹剑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很阴险地对待我们呢？

另一天的晚上，当我们十余个伙伴在街道上踟蹰着，刚悄

悄地拐往一条弯曲的小巷时，瞅见了三个强盗正往一座小楼外面的围墙上攀援，我们像一阵风儿似地扑过去，就发现他们扭转身子窜到旁边的屋檐底下，胡乱地朝我们开了几枪，立即从狭窄的巷子里消失了，我们也飞奔了过去，只见他们冲向附近那座倾圮的城墙，我们又紧跟不舍地追赶了上去，十余支步枪和手枪一起射击，这三名强盗呼叫着跳进宽阔的护城河。我们站在城墙上又尽兴地扫射了一会儿，然后就眺望着黑漆漆的河水，没有听到丝毫的动静，老姜才笑呵呵地招呼我们往回走去。这可以说是我生平最初和最末一回真刀真枪的“作战史”。

后来又接着巡夜时，老姜已经不再带领我们了，消息灵通的小周告诉我说，老姜本来是要升成治安处里的科长了，怎料从他扬州的家乡寄来一封检举信，揭发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组织。据说也早就有意想荣升科长的一位老大哥，十分积极地向外长请战，让他主持去弄清楚老姜的这一段历史，老姜面对着自己这难缠的克星，态度显得异常的僵硬，认为是别有用心的诬陷。因为不跟领导合作搞清自己的问题，前天就已经被隔离审查了。听着小周的话儿，我竟有点儿同情起老姜来，怎么能根据一封毫无凭证的信函，就隔离和冤枉自己的同志呢？

有一天傍晚，小周从走廊里飞奔过来，双手压住我肩膀，喘着气说老姜在他禁闭的小屋里上吊自杀了，尸体被安放在一块木板上，正搁在天井里等待着运走，我赶紧拉住小周走了过去，瞅见老姜睁着的双眼，和伸出嘴唇的舌尖，心里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如果他真的是被冤枉了，那么洁净的心灵就应该是毫无芥蒂的，应该充满信心地活下去，一个挺有计谋的人怎么会如此脆弱呢？如果是因为丧失了提拔的机会，感到丢弃了荣誉，才出此下策的话就更不应该了，早就听说革命阵营里职位的高低，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。他也亲口讲过多少回这

样的道理，难道只是虚假的应酬吗？一个人为什么要活着，是真诚地奉献自己，还是戴着华采的面具，却很隐蔽地去攫取什么私利呢？

我暗暗地思忖了许久，感到似乎懂得了好多以前从未想起过的事情，却又似乎觉得先前已经明白的不少道理，又变得有点儿飘渺和朦胧起来，这一年我刚满十八岁的生日，多么想朝气蓬勃地生活下去，却又不能不偶或升起一丝惶惑的念头。

藏书和查书的故事

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深夜里在街头巷尾的巡逻，映照着皎洁的月光，静悄悄地站在狭小而又破旧的石桥上，凭栏俯瞰着小河里粼粼的水痕，在月儿圆圆的倒影周围闪烁时，立即想起了杜甫的“中天月色好谁看”这句诗来。漫漫的长夜，大街小巷都寂寥无声，苏州城里的多少人们，正跌落于甜蜜和深沉的梦乡，除开我们这几个身穿军装和手挎枪支，在东张西望地寻觅着盗贼踪影的伙伴之外，还会有谁仰起头颅眺望这月亮的清辉呢？

过了不久之后，我又被调往无锡郊外的太湖之滨，到一所干部学校里去从事教学工作，整天都要给来自苏南各地接受短期训练的基层干部，讲授政治理论和革命历史的课程。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读过的书籍，实在是稀少得太可怜了，怎么敢眼睁睁地走上讲台去献丑呢？承蒙校长同志的热心抬举，非要我担当这样的重任不可。当他在阅览室里默默地巡视时，常常发现我独自坐着读书看报，他还仔细倾听过我在学习会议上的几次发言，也许会感到还算得上是思路清晰和口齿伶俐罢。按照他的眼光推测起来，这肯定已经是符合足够的条件了。他睁着晶亮的眼睛，兴冲冲地鼓励我说，“你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，还不能当个理论教员？”

在五十年代初期那种洋溢着革命气氛的环境里，早已存在着一条似乎是谁都应该遵守的规矩，这就是必须十分愉快地服从各级组织的分配。何况这位怂恿我去讲课的校长，听说从少年时代在江西苏区参加革命之后，就南征北战，戎马倥偬，袭击和炸翻过敌人的多少碉堡；他原先是个一字也不识的文盲，而今面对着上千人作报告时，都是自己动笔写成的讲稿，临时